

前言

我们的科学与生活

郝柏林说，他在19岁时已经认识我。我记忆中的彼此相识要比他说的晚一年。他那时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后来始终坚持在理论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线。我曾经是申请加入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九三学社的成员，但很少参加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字统一战线工作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可以说是我们半个多世纪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写照。2008年一个科学家传记书系编委会邀请我执笔撰写郝柏林传记时，我欣然同意。

我们这一代中国科学工作者所历所为、所见所闻，可歌可泣、可叹可恨之事，实在太多。与许多同龄人相比，郝柏林是一个幸存的成功者。以心直口快的个性而免于成为“右派”分子。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还在科学上做了些事情，在46岁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¹之一。他深知自己并没有做出足以在科学史上长久留存的成绩。然而，这并非因为个人不努力或不聪明。在中国摆脱封建落后和列强欺辱，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

¹ 1993年起称为院士。

渡期，郝柏林属于始终坚持在自己的劳动岗位上，尽最大努力奋斗过的那一批人。一方面，他们已经接近在所处的历史初始条件和社会边界条件下的最好解；另一方面，个人的聪明才智也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而无法全部用到科学事业上。他们的经历不应在年轻的一代人身上重复，但却应当为年轻人所知晓。这是我同意撰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

郝柏林常说，他是一个游击战士。原来已经准备好从学生干部转成中等教育事业的普通一员，却因为偶然机遇到苏联上了大学，又从“煤炭工业的经济和组织”转学理论物理。他做过基础研究、国防任务和工业应用，在凝聚态理论和统计物理、计算物理和非线性科学，以及理论生命科学领域都有过一些学术贡献。不是他喜欢跳来跳去，而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势使然。他的早期科学工作是“祖国需要什么就干什么”，包括自己主动请缨。只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他才在非线性科学和理论生命科学领域打了两场阵地战。



图1 张淑誉和郝柏林（2004年）

郝柏林对于继承了千年封建影响的中国官场有自己的认识。他几度避开了陷入学术官场的遭遇，始终坚持在科学研究的第一

线。但是，他决不是一位沉默的旁观者。对于青年人他一向积极地鼓励和支持，对于科学技术政策和学术风气方面的问题，“只要碰到枪口上”，他就会发言或撰文，直接说明观点。有人说，郝柏林得罪过许多人。郝柏林却始终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所说的“他可能有过很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来要求自己。

我和郝柏林虽然60年相濡以沫，但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还得靠他自己的记忆和叙述。我有时直接引用他在不同时期发表过的文字材料，还使用了一些未曾发表的回忆片段。从郝柏林1956年“归队”学理论物理，直到63岁时转入理论生命科学领域以至今日，我就一直在他身边，而且是他一部分工作的具体助手。虽然如此，学术贡献的表述，还要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他本人的帮助。

我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努力摆脱一般传记的固定格式。最初曾设想按照时间顺序，分几十个小节叙述。后来决定遵照一家出版社建议的体例，大致按内容分章，章内再分节。为便于阅读，黑白照片和从彩图变换出的灰度图都直接排印在正文里，彩色图片还集中放在插页里。不过这样一来，有些地方就不能照顾时间前后。无论如何，我力争忠于历史事实地描述一位科学研究前线的普通负载战士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希望为读者留下一点知识和趣味。究竟做得如何，只有留待读者评说。

这本书从2008年2月同一家出版社签约开始撰写，原计划在郝柏林80岁前出版。不过付梓过程曲折多变，换过多家出版社，甚至几度出书无望。因此，少量为此书准备的素材和图片，曾被用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同仁为庆祝郝柏林80岁诞辰编辑的文集²中。我要在此说明这一情况。

² 刘寄星、郑伟谋编，《挑灯看剑集——贺郝柏林院士八十华诞》，科学出版社，2014。

我和柏林的共同好友尤拉 (Yura V. Kornienko, 见图片 8.15) 回答了我们多次电子信询问, 使沙俄、苏联和俄国的某些往事说得更确切。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程希有老师和复旦大学左光宏博士在 LATEX 排版技术上给予指导。几家出版社虽然未能印行此书, 但是多位编辑曾经对书稿提出过改进建议。我们一并在此致谢。我们还要特别申明, 书中的全部事实和观点由作者和郝柏林负全部责任, 与出版社没有任何关系。